

古代兵法要籍选译

吴如嵩 霍印章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5

古代兵法要籍选译

吴如嵩 霍印章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375 印张 105千字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5291·011 定价：1.15元

印数：1—25,000

出版说明

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里，古代军事著述是一束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奇葩，内容十分丰富。它是古人军事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曾经哺育了无数精兵良将，指导和影响了历代的军事活动。为方便大家对古代军事思想、军事学术的研究和借鉴，有分析地汲取其精华，以繁荣今天的军事学术，我们确定从我国古代军事著述中，选其精要，加以注释，陆续编辑出版这套带丛书性质的“古代军事著述选读”。

这套书的选题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的军事专著，而且也包括散见于众多古籍中的军事论述，以为读者和研究古代军事人员较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著述提供方便。

为便于阅读，每书在认真选好底本的基础上，认真搞好标点、注释，并酌情进行今译，对一般读者不易了解的名词术语、典章制度、人名地名、历史事件以及典故和词语的出处等，作出简明注释。生僻字词，一律注音。有了注解，一般读者仍不易理解原文的，则用通俗文字进行语译。

这套书将陆续印行，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及专家们的帮助和指教。

前 言

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中，古代兵书是别具异彩的一颗明珠。其时代之悠久，数量之繁富，内容之精深，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我国古代兵书，据陆达节《中国兵学现存书目》载：“约略估计，当在二千种以上；迄今尚存者，亦当有三、四百种。”证诸历代《艺文志》和诸家著录，其说大体可信。

所谓“兵书”，即指军事领域内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的论著。本书所选译的篇章，只是属于理论科学范围内的部分名著，因而未能反映我国古代兵书的全貌。

为了照顾到历朝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摘选了二十一部兵书的个别篇章，并在每篇之前对其书的内容和所选篇章进行概略介绍。为了便于读者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个概略的了解，这里，我们仅就自己在学习和译注兵书过程中的一时之得，一孔之见，略加阐述，并就正于专家学者与读者同志们。

（一）关于战争问题

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政治的继续。按照史学界一般的说法，我国自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起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于是，有了国家，有了军队，有了战争。在将近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不知发生过多少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战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指导者和兵学家们努力探索致胜的各种因素。

首先，他们朴素地认识到战争的政治性质是关系胜负的首要

因素。例如《易经》说：“师贞丈人吉。”“贞”就是“正”，正道、正义。认为兴兵打仗，合于正义，又任用“丈人”（老谋深算的人），就能获得胜利。所谓“正义”，当然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的标准。可贵的是，古人在判断正义与非正义时考虑到了人民的条件。例如《司马法·仁本》鲜明地提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特别是当地主阶级处于封建制初期阶段，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革新进步的精神，是比较注意民众的拥护和士兵的支持的。他们看到，这种拥护和支持，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正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军队为正义而战就理直气壮，为不义而战就理屈气衰。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战国时代，《尉僚子·兵令》就对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表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它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意思是说：军事较之于政治，是从属的（是“植”），是现象（是“表”）；政治较之于军事，是主导的（是“种”），是内容（是“里”）。

政治既然关系战争的胜负，因此，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都竭力主张修明政治，争取民众的拥护。《韩非子·五蠹》指出：“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军事实力的强与教育训练的治，是进攻敌人或防御敌人的必要条件，而这条件的取得，关键在于有良好的政治——“内政之有也”。在政治对军事的决定作用上，《孙子·形篇》作了高度的概括：“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当地主阶级失去其新兴时期的革命性、进步性以后，便逐渐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春秋战国时代兵学家的这些高论也便成了地主阶级的绝唱。既后的兵书中虽然也有“仁”“义”之类的言词，但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却不过是进行欺骗和麻痹的鸦片罢了。

政治关系战争的胜负，然而，战争毕竟是力量的竞赛，“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对付”（《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9月26日）。因此，客观物质力量的强弱是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有远见卓识的兵学家无不主张发展社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提倡农战，富国强兵，而不是靠空谈正义制胜的。《墨子·七患》说得好：“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

军事实力，首先是国富，所谓“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表现在战场上，两军争胜的关键，主要是兵力的强弱问题。用今天的军语说，就是战役容量的计算和敌我兵力的对比。这个问题，《孙子·形篇》中有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它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意思是说：根据战场地形的险易得出地幅大小的“度”，根据战场地幅的“度”得出战役容量多少的“量”，根据战役容量多少的“量”得出参战兵力众寡的“数”，根据兵力众寡的“数”得出军事实力强弱的“称”，根据军事实力强弱的“称”得出谁胜谁负的判断。《孙子》接着明确指出：“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一镒是二十四两，一铢是二十四分之一两，胜败双方兵力相比是五百多倍。这固然是形象的比喻，但也可以看出众寡是何等的悬殊。这样，古代的兵学家既看到了政治性质是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也看到了民心的向背和客观物质力量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古人这些认识都有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但是，这些名言粹语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衡量，去考察，确有不可逼视的光辉，应当引以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二）关于作战指导

那么，战争的胜负是否仅仅取决于实力的强弱众寡呢？《孙子兵法·客主人分》作了十分深刻的说明：“众者胜乎？则投算

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孙臆在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根据战争规律所实行的正确的作战指导。我国古代兵学家对于作战指导有着丰富而独特的论述，这些论述是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的珍贵遗产。

古人说孙子尚智，孙臆贵势。智，就是高明的指挥；势，就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所创造的有利作战态势。二者都是讲的作战指导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仅从以下五个方面略加阐述。

（1）、知彼知己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知己，每战必殆”，是《孙子·谋攻》中一句名言。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其所以是“科学的真理”，因为它揭示了战争中的一条普遍规律。

众所周知，战争最基本的矛盾，在作战形式上表现为敌我双方所进行的进攻和防御。作战指导最重要的前提是正确认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力求取得全面认识，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或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如果既不知彼又不知己，鲁莽灭裂，“无虑而易敌”，那就“必擒于人”（《孙子·行军》）。

比较而言，知彼与知己，以知彼为难。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伪难辨。因此，古人更多地是关于知彼方面的告诫和论述。例如，“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要轻易进兵）；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要轻易约期会战）；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要轻易行动）；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不要轻易列阵交战）。”（《管子·七法》）

战争中，需要了解的敌情是多方面的。《三略·上略》曾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随着战争的发展，“知彼知己”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丰富，抽象地说：“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必然。”《（历代名将事略·料敌）》一言以蔽之，“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九变》）。

至于“知彼”的方法，就是侦察。一是间谍侦察。《孙子·用间》中提出了五间，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对于这五间，历代兵书中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二是战斗侦察。《孙子·虚实》中提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角之”，就是试探性的战斗侦察。如何把握战斗侦察，《武备集要》说得较为明晰：“凡素未交兵，两不相习，或用一军以观其强弱虚实，谓之尝战（试探性的战斗侦察）。但尝战不可大战，不可久战，少尝即收归；且必设接应救援之军，以备缓急，恐尝者陷，且恐尝者陷而摧我大军也。”

虽然说知彼难于知己，但知彼与知己却是相互关联的。彼与己，敌与我，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这一点，孙子已清楚地看到了。他在《地形》篇中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这是何等深刻的阐述，何等周密的分析！

孙武所说的“知彼知己”，决不是仅仅单就敌我两方的兵力和军情而言，而是有着较为广泛的内容的。单是《计篇》所说的“五事”“七计”就反映了“知彼知己”的丰富内容。按其所述，就要“知道”（敌我友的政情与国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战争），要“知天”（各种天候乃至星象时日），要“知地”（各种地形），要“知兵”（将帅的贤愚，训练的优劣，军纪的好坏，战斗

力的强弱，战术的异同），要“知法”（军队编制，后勤供应，武器装备），等等。通观《孙子》全书，它正是在这种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基础上探讨战争的指导规律，因而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

（2）运筹决胜

在世界文化史上，东西方明显地反映出不同的特点，在军事学术上也不例外。作为东方的中国古老的军事学，的确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自先秦以来，重视运筹决胜至少是其特点之一。

古代帝王，常在庙堂决定军国大计。因此，庙堂决策又称为庙谋、庙算。孙子的第一篇《始计》，就是论述庙算问题的。他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他把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诸条件所作的对比，作为预测胜负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是后来刘邦所说的“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庙堂决策的所谓庙谋，关于军事的就是今天所说的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古人都强调先谋后战，以谋为本。如《投笔肤谈》说：“本谋者，以谋为本也。《太公传》曰：‘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后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为本谋。’”太公姜尚是否著有兵法二百三十七篇，其中专论兵谋的就有八十一篇（见《汉书·艺文志》），难以考究。但是，现存的托名太公与文王、武王谈论兵学的《六韬》中，倒是反映了重视谋略的思想。如《发启》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军势》说：“上战无与战。”

这里所说的“全胜”、“上战”就是指最佳决策，它和孙武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看作是最理想的战略，同一意义。这种最上乘的战略，在《孙子》所处时代是能达到的。作为流血牺牲的战争行动，总是企求把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把胜利扩大到最

高程度。这就要求在作战指导上应尽量制定出一个高明的战略方针，以期达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六韬·龙韬·军势》）。

古人在关于制定“万全之策”时，除了谈到要综观全局，做到谋深计远，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痛言二·迁都建藩议》）外，还主张一要保守秘密，“谋成于秘，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兵经百篇·秘字》）二要果断决策，不能优柔寡断。《兵镜吴子十三篇·计战下》说：“战胜而败者有五：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一败也；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二败也；机事不密，三败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败也；主将不一，五败也。此五者皆战胜而必反败也。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必，兵权贵一也。”三要有几种情况下不同处置的预案。如果战争进展顺利，采取何种方针；如果受挫，又如何对付，等等。《兵经百篇·叠字》对此有明确的阐述：“故善用兵者，行计务实施，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迭出，算无遗策，虽智将强敌，可立制也。”意思是说，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考虑到意外挫折的，估计到中途变化的，并防止将帅不听节制。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前计未用，后计又备，如此层出不穷。这样，敌人再狡猾和强大，也可以战胜之。

（3）先胜后战

《孙子·形篇》有一句名言：“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用今天的话说，就含有不打无把握之仗和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意思，这一思想是作战指导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在战略上要如此，战役、战斗上也应如此。

所谓有准备，含义甚为广泛。《淮南子·兵略训》说：“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必先加强自己的力量），而后求诸

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加强兵力，完善部署在于自己；寻机制胜，在于敌人是否暴露弱点），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战前要有准备，战中要有准备，时时处处都不能丧失警惕，放松准备。《兵经百篇·谨字》说：“用兵者，无时非危（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危险的），故无时不谨。入军如有侦（在军中就要象有敌军侦探跟着），出军俨临交（部队开进之后就要象同敌军交战一样），获取验无害（获取物品要检查是否有害），遇阻必索奸（在山地丛林要搜索敌人奸细），敌来虑有谋，我出必须计，慎以行师，至道也。”《百战奇略·备战》也指出：“凡出师征讨，行则备其邀截，止则御其掩袭，营则防其偷盗，风则恐其火攻。若此设备，有胜而无败也。法曰：‘有备无败。’”

所谓有把握，首先是具备战胜敌人的力量。所谓“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商君书·画策》）。其次是具备胜敌战机。比如正确实施了“以聚攻散”（集中打分散）、“以实击虚”（集中兵力乘敌之隙），“以疾掩迟”（快速机动打敌迟缓），“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及“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等，利用自己的优势，主动打击敌人，都是有把握取胜的条件和战机。

（4）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主要是讲观察战机，估量敌我的战场态势。孙武子在《计篇》中指出，当对敌我诸条件作出正确判断之后，就要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创造有利的对敌态势。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所谓“计利以听”，就是内谋于庙堂——定计；所谓“以佐其外”，就是外谋于战场——造势。

《孙子》中有《势篇》专门论述“势”的问题，它用激水漂石来形容“势”的险峻。《孙臆兵法》中有《势备》，也是谈“势”的问题，它用弓弩的射速迅猛来形容“势”的险急。《吕

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臆贵势。”其实，孙臆正是继承了孙武关于“势”的观点。

那么，“势”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孙子》告诉我们，“势”是“形”的运用，也就是军队实力的发挥。用哲学的语言说，“形”是运动的物质，“势”是物质的运动。“三军之势，莫重于将”（《投笔肤谈·军势》）。有利态势的造成，要靠指挥员的聪明才智。比如打伏击，我军控扼有利地形，当敌就范时发起勇猛冲击。这就是《孙子·势篇》所说的“其势险，其节短”。占领有利地形就是“势险”，冲击距离保持在发挥最大战斗力的距离上就是“节短”。能否掌握好时机和火候，就看指挥员的智勇了。从这个例子也可看出，冲击之前的军队战斗力是处于静止状态的，是“形”；冲击之后，敌斗力充分发挥出来，就表现为动态的破竹之“势”了。

态势是否有利，关系着主动和被动问题，关系着胜败问题，所以历代兵学家十分重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对于“势”的要求来说，古人谈到的无非是我主敌客，我实敌虚，我逸敌劳，我众敌寡，我险敌夷等等。括而言之，我有利敌无利，我主动敌被动。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大体说来一要善于“决胜料势”（《历代名将言行录·唐阎宝语》），二要善于“因势而动”（《历代名将事略·先击》）。

关于“决胜料势”，《司马法·用众》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备，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总之，是要在周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有利的态势。

关于“因势而动”，就是要善观风色，乘势击敌。《孙子兵法·虚实》用水来比喻这种军事上的“因势而动”。它说：“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者谓之神。”作战是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固定态势的，重要的是，指挥员要善于根据不同的敌情、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地形等等采取适当的部署。所谓“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白豪子兵鉴·变》）。

（5）关于后发制人

后发制人与先发制人，通常是讲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至于遭遇、追击、退却等等不过是攻防在特殊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先发制人，一般要求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例如《军中圭臬》说：“凡集兵敌境，必须敏捷，勿（务必）使津梁不及发（使敌来不及整理交通），要塞不及修，城险不及设，内兵不及集（预备队来不及集中），外助不及援，粮饷不及敛，车马不及聚。虽入其境，无人境焉（如入无人之境）；虽遇其人，无人人焉（如遇无军之地），此兵法所谓独出独入也。”这些要求突然性、快速性的主张，对于我们作为战役战斗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想着重谈谈战略防御问题。我国古代关于战略防御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列举了若干古代采取“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和实行积极防御取胜的战例，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不再赘述。

从军事学术的角度看，古人确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引为借鉴。

“后发制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渐丰富了它的内容。《孙子》讲的“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可以看作是后发制人最古朴的主张。从历代兵学家的意见看，对于后发制人大致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先让一步，诱敌深入，待敌我强弱易势之后再行战略决战和战略反攻。这种主张，是大家所熟悉的。另一种是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城深池，

阻止敌人深入长驱，在顽强抗击中相机破敌。对于后一种主张，我们征引几条有代表性的意见如下：

战前要实行重点设防，重点守御，充分做好防御准备。如说：“是以修封疆（巩固边防），守要害，蜚蹊隧（阻绝要道），垒军营，谨禁防（严密警戒），明斥候（注意战略侦察），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陆宣公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又如《兵家要领·逆战篇》说：“敌未至之时，相便地，据险阻，坚营垒，励兵马，激士气，固阵势，审战所（选择利于歼敌的战场），何处可以扼吭，何处可以出奇，何处可以剿杀，所谓知地形之可以战者胜也。”

防御要积极主动，不能实行消极防御。早在宋代的陈规《守城录》中就指出：要“守中有攻”。明朝袁崇焕有一句名言：“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进攻虽然力量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由防御转入进攻时兵力就不会感到不足了）”（《历代名将言行录》卷二十八）。发挥积极防御的手段是多方面的。《经武要略正集·坐制篇》指出，“善守者，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敌不进攻，诱其进攻以就我范围），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众，或彼来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制敌之道也。”

无论先让一步或据险抗击，要打破敌人的战略进攻，一般都要经过“与之持久”的过程。《李卫公问对》引范蠡的一段话颇能体现这一思想：“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意思是说：后发制人是用潜力，先发制人是用锐气，最大限度地挫敌锐气，最高程度地发挥我军的潜力去消灭敌人，这就是军事家运用潜力和锐气的奥妙所在。

（6）其它

古代的兵学家对于作战指导的论述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述

外，还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内容，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例如，集中兵力的原则，《孙子》早就说过“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在作战方向选择上，《管子·制分》就提出了““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进攻强点，弱点也会变成强点；进攻弱点，强点也会变成弱点）。这和《孙子》所说的“避实击虚”，孙臆所说的“批亢捣虚”，都是一致的，即要选择敌人薄弱部作为主攻方向。在战术上，历代兵学家都宗法于《孙子》的奇正多变的原則，要求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术。《兵镜吴子十三篇》指出：“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交战之际，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则胜。”总之，要求利用欺骗和佯动，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然后以快速机动的兵力，突然打击敌人，夺取胜利。冷兵器时代，都是方阵作战，无疑要求密切的协同。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由于兵种的增加，密切协同更为重要，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代储大文指出：“战于平原莫过车，战于近边莫过骑，战于边外莫过步。三者具备，乃可选相为用，又三者虽各自为用，然亦必相须为用。故御冲以车，卫车以步；车以步卒为用，步卒以车而强。骑为奇兵，随时指挥，其势盖兼资也。”在兵法著作中，诸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孙承宗的《车营百八扣答汇编》、宋祖舜的《守城要览》等，都谈到在火器大量使用于战场后如何配合、协同作战的问题。

（三）关于军队建设

军队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的一种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条件下，军队的使命是保证统治阶级对奴隶或农民的强制剥削，保卫本国的领土或扩张领土、抢掠财物。这是奴隶制、封建制国家军队的社会本质和基本职能。这是我们对封建社会乃至奴隶制社会中军队本质

的基本认识。

我国古代，系统反映奴隶制军队的兵法已看不到存世之作，大量反应治军理论的著作主要是地主阶级在其各个时期的历代兵书。今天，我们介绍古代兵法中的治军理论，正是基于对封建军队的上述认识，来肯定其民主性精华，否定其封建性糟粕的。

第一，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选将标准。

古代军事家十分重视将领的任选，《孙子兵法·计篇》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选将标准。所谓“智”就是高明的指挥，“信”就是严明的奖惩，“仁”就是官兵的团结，“勇”就是身先士卒，“严”就是严格的纪律。

战争是通过军队在战场上的厮杀所进行的流血斗争。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选将标准固然有其强烈的阶级意识和特定含义，但是，不同的阶级赋以新的解释后，仍然是一条期求战争胜利的军队所必须共同遵循的规律性的原则。正如《六韬·龙韬·奇兵》所说：“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一句话，如果将领庸懦无能，等待他的只是败军辱国。

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将德”问题高于“将才”。这在封建社会的兵书中有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明朝戚继光明确指出：“才艺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才。苟有人焉，以不二之心，发于事业，昼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才，必尽一尺之用。至于多才之徒，或巧为身谋，或明习祸福，用之自私，虽良、平之智，孔明之术，我何所赖？故曰：有将才而无将心，具将（无用之将）也。无将心，斯无将德。将德靡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骄将，有逆臣，有骄矜之行，有盈满之祸，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卫国保民，为始终之完器矣。”这一番议论，可谓把将帅选拔的德才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如果将无德，即使有张良、陈平、诸葛

亮那样的才干，也是不能重用的。

将德问题上，戚继光在这里所说的“将心”（忠心）是最根本的。除此而外，古人还谈到一些属于道德品质方面的内容。例如，《三略·上略》说：“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要求将领廉洁奉公，公平处事，明辨是非，虚心纳谏，联系部属等等，都是将德问题。

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也是将德问题。并且早在战国时代的兵法中就屡见不鲜了。如《尉繚子·战威》说：“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强调要以将帅的表率行动——“率身”——去激励部队。同书在《武议》中对这种“率身”有进一步的阐述。它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要求将帅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是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进步性的表现，也为后来有见识的军事家所效法。诸葛亮就说过：“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将苑·励士》）也强调了表率作用对部队作风培养的作用和影响。

在选将标准确定之后，历代进步的军事学家都主张当政的统治者实行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反对以贵贱亲疏的任人唯亲的路线。任人唯贤，那就要如《六韬·文韬·举贤》所说的那样：“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能，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新兴地主阶级这一理论武器实行之后，在反对奴隶制腐朽的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斗争中起到过革命的进步的历史作用。

第二，教育和训练。

古代兵法中关于军队的教育、训练问题有大量的论述，所涉及的范围也甚为广泛。这里，仅就几个主要观点略加介绍：

爱兵问题。爱兵的观点产生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军队中，由于其军队成分主要由农奴和平民组成，而农奴和平民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同盟军，他们有着暂时的、一定程度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所以，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作的《孙子兵法·地